

赣鄱农耕文化的意义
——以《赣鄱农耕文化研究》为视角

王建平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江西社会科学杂志社,江西 南昌 330077)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5)02-0141-04

江西亦称“赣鄱”,因为赣江水系和鄱阳湖水系正好涵盖了江西的地域范围。江西人出于对水的深情,习惯称江西为“赣鄱”。赣鄱地域农业历史悠久,并在此基础上孕育了底蕴深厚的农耕文化。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施由明研究员,多年来潜心于农史研究,尤其在赣鄱地域研究方面深耕多年,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尝试通过施由明研究员所著《赣鄱农耕文化研究》一书,对赣鄱农耕文化的意义作些探讨。

一、《赣鄱农耕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特色

《赣鄱农耕文化研究》于2024年12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1章,超过30万字,并附300多幅与农耕有关的图片,装帧设计精美,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该书依据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详细追溯了赣鄱地域从旧石器时代末期至现当代一万多年农业发展的脉络,深入探讨了由农业耕作衍生的相关文化及其与社会发展等的关系。内容涵盖旧石器时代末期经新石器时代的农业考古发现、商代至现当代的农业科技发展历程、耕作技术、水利技术、生态智慧、物产文化(特别是茶文化)、民俗风情、传统村落、饮食文化、农业文化遗产,以及当代赣鄱农业的发展状况和美丽中国“江西样板”取得的成就,在结语部分,该书深刻阐述了赣鄱地域自古至今在粮食生产方面的卓越贡献,以及耕读传家对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同时,书中还探讨了近现代江西农业农村衰落的原因,并展望未来科技兴农的美好远景,特别强调了赣鄱农耕文化的独特品质。尤其是对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发现及发掘全过程的生动描述,不但揭示了江西对世界稻作文化的卓越贡献,更全景式展现了赣鄱农耕文化的壮丽画卷。

进入新世纪以来,地域性的农耕文化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如胡泽学著《三晋农耕文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于凌著《东北农耕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汪庆华主编《中原农耕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以及梅学书著《鄂东农耕文化》(华中师大出版社,2024年)等,均在相关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相比之下,《赣鄱农耕文化研究》一书则以其鲜明的特色脱颖而出。

在此之前,施由明研究员已出版了《农耕文化》一书,作为《江西文化符号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由江西人民出版社与江西美术出版社于2021年4月联合推出。而《赣鄱农耕文化研究》则是施由明研究员深厚的学术积累带来的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内容更丰富,站位更高远,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故土家园的深深眷恋之情。

相较其他地域农耕文化专著,《赣鄱农耕文化研究》一书最显著的亮点在于,它深入剖析了赣鄱农耕文化的地域特质,以及这种特质所孕育的地域文化发展特点,并探讨了这种特质与社会发展的紧密联

[收稿日期] 2024-08-27

[作者简介] 王建平(1966—),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江西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农业史与中国茶文化。

系。此外,该书对现当代农业状况、农业特色及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阐述,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地域农耕文化著作的亮眼之处。最后,《赣鄱农耕文化研究》一书的出版不仅丰富了江西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而且对于推进赣鄱地域历史文化研究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二、赣鄱农耕文化博大精深与底蕴深厚

农业耕作是古代中国社会中最基础和最重要的生产方式,人们在农业生产和农耕生活中产生的物质文化和绵延不绝的思想、情感及智慧等精神文化,共同构成了农耕文化。赣鄱地区农业耕作方面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不仅底蕴深厚,而且内容广博且精深。最突出地表现在一万两千多年前,赣鄱地域的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先民们已经开始探索水稻的栽培,尽管他们以渔猎和采集生活为主,但他们已经将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同时,已掌握了烧制陶器技术,能够将动物骨格制成骨笄,将贝壳磨制后串起佩戴,这不仅体现了先民们的生活智慧,更藉此反映了他们对美的追求。此外,他们在磨制后的骨板上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可能是用于记事,也更有可能是代表文字的最初形态。

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考古遗址,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及晚期考古遗址如修水县山背村跑马岭遗址、永丰县尹家坪遗址、清江樊城堆遗址、九江神墩遗址、九江湖口县文昌汛遗址、新余拾年山遗址等,这些遗址的出土物都充分表明了新石器时代赣鄱先民丰富多彩的农耕和渔猎生活。而新干大阳洲商代遗址出土的494件青铜器,有9种共33件青铜农具,这些农具的出土向世人表明了商周时代赣鄱地域的农业耕作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他们懂得用犁(可能是人拉犁)来翻地,用锸、耒、耜、铲、斨、耜等工具来整地,以及用镰、铎(小镰)等农具来收割稻子。在赣鄱这片土地上,创造了堪与中原文明媲美的商代文明。

此后,赣鄱地域经历了从商周的铜石并用时代到两汉时期铁器的广泛推广,特别是铁器与牛耕的结合,为两千多年来土田耕作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经两汉三国、魏晋隋唐直至宋代,近千年的农耕智慧积累,赣鄱地域的人们形成了以犁耕为基础的精湛水田耕作技术,并发明了适合于南方水田耕作的“江东犁”。至北宋时期,赣鄱先民已掌握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进入元明清时期,他们继续将水田耕作技术推向精细化,并在丘陵山地推广了水果和经济作物的种植。近代以来,受国外农业技术的影响,化肥开始被普遍使用,但在赣鄱地域,传统的生态施肥方法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赣鄱地域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积极推广现代农业机械的普及与应用。到了21世纪,尽管传统的农田耕作技术仍然得以传承,但农业机械和互联技术已广泛运用于农业生产之中。

在农业耕作技术不断提升和农耕生活日益丰富的背景下,赣鄱地域人们的农业生态智慧也得到了不断的积累。他们巧妙利用水力资源,修筑水利工程、研制水利工具,实施生态施肥,推行多熟种植,开拓梯田等,展现出了高超的农业生态智慧。为了总结农耕智慧,赣鄱地域涌现了一批重要的农耕著作,如宋代曾安止《禾谱》和曾之谨《农器图谱》、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和朱权《茶谱》、清代刘应棠《梭山农谱》等。

赣鄱地域的人们在辛勤耕作的基础上,收获了丰富的物产,并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他们将思想情感贯注于物产和美味中,产生了具有浓郁赣鄱地域特色的物产文化。其中,茶文化最具代表性。赣鄱地域不仅茶史悠长、名茶众多,还有让人陶醉的茶艺、茶俗以及茶歌、茶戏等丰富的文化表现形式。

在享受劳动成果的同时,赣鄱地域的人们为感天谢地的恩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俗活动,如鞭春牛、春祈秋报等,这些都是农耕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农业耕作,赣鄱地域的人们获取到足够的生存资源,人口得到繁衍与传续,宗族不断壮大,形成

了聚族而居的农耕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留存了众多赣鄱地域的传统村落,成为当代赣鄱地域宝贵的农业文化遗产。历经万年的发展,赣鄱地域仍然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在保持稻作为主的同时,赣鄱地域还积极发展了休闲农业、有机农业和智慧农业,美丽中国“江西样板”正不断呈现新的面貌与活力。

三、赣鄱农耕文化是具有地域特质的文化

赣鄱地域的地理特点是东南西三面环山,东有武夷山脉与福建交界,南有南岭山脉与广东阻断,西有罗霄山脉与湖南相隔,只有北部为向长江倾斜的鄱阳湖平原,这就注定了赣鄱地域的人们只能向土而生。尽管该地区亦有连通长江的鄱阳湖及2400多条大小河流,适合发展渔业,但是内陆河湖的这点渔业体量不够,只能作为副业而不能成为主要生计。因此,赣鄱地域的人们以平原、盆地丘陵和山地为主要生存资源,形成了三大农耕文化特质或基因。

(一)勤耕作,吃苦耐劳

向土而生,面朝黄土背朝天,长期的耕作,形成了赣鄱地域主流大众如泥土般温柔敦厚的性格,特别能吃苦,特别勤劳,所以,“勤耕作,吃苦耐劳”这一特质在明清江西方志中多有记载。如在清代赣鄱方志的风俗篇开篇,常引用《隋书·地理志》中的描述;“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以此来概括赣鄱地域的民风。此句意指读书人勤于学问,普通民众则勤于耕稼,这不仅是赣鄱民众的基本素质,也是中华文化所推崇的优良品质,国家与社会对此均持认可态度,进而转化为家族或宗族对族人、家人的要求。翻阅清代和民国年间赣鄱地域的族谱族规、家训等中都有强调勤劳的规条,即“勤生业”,表明了赣鄱地域的民众对“勤耕作”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二)重文化,耕读传家

勤勤劳作,即“服田力穡”只能解决温饱,最多略有盈余,但若要使家庭、家族或宗族兴旺,便需培养子弟科举入仕。隋代科举制度的实施,为普通民众子弟提供了一条科举晋升之路,千百年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理念激励了无数赣鄱子弟去奋发读书、致力科举。因此,“重文化,耕读传家”成为赣鄱农耕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

赣鄱地域的人们“重文化,耕读传家”这一特质,尤其在宋代至清代得到显著体现,赣鄱地域成为中国的文化名区。据光绪七年刻本《江西通志》卷二十一《选举表》^①统计:唐代江西共产生进士65人,占全国进士总人数的比重还不小,但到宋代时科举人才辈出、文化精英群体涌现:北宋江西有进士1745人,南宋3697人,两宋江西进士共5442人,约占两宋进士总额的六分之一,在全国排名第二。宋代江西的文化名人以家族或宗族前后群体涌现,如庐陵欧阳修家族、临川王安石家族、南丰曾巩家族、双井黄庭坚家族、金溪陆九渊家族等。宋代江西还有众多文化名人都是以家族或宗族群体的形式出现,如清江刘氏墨庄(刘敞、刘攽)、临川晏氏(晏殊、晏几道)、高安刘恕家族、德兴汪藻家族、鄱阳四洪(洪皓、洪遵、洪迈、洪适)、临江三孔(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德兴董氏(董洙等)、余干赵氏(赵汝愚等)、都昌曹彦约家族、庐陵王庭珪家族、吉水杨万里家族等。

元明清时期,赣鄱地域延续着这一文化基因,除产生了一批批文化名家和政府大员外,还分别产生进士207人、3114人、2279人^②,进士人数屡创新高。至近现代,赣鄱民众仍然把这一传统发扬光大,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一批批的赣鄱学子通过高考脱颖而出,走向全国乃至登上世界舞台。

(三)保环境,生态智慧

^① 光绪《江西通志》卷二十一《选举》,《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江西》,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457-478页。

^② 据光绪《江西通志》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

向土而生的赣鄱地域的人们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努力做到可持续发展。赣鄱地域的民众,在耕作制度上较早采用多熟种植与间作套种,实施生态施肥,巧用水力并开拓梯田,以充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此外,他们还通过乡规民约来保护生态环境。

乡规民约是社会基层组织成员共同制定并遵守的行为规范,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持续的传承。赣鄱地域的乡规民约中不乏保护生态的条款。从《周礼》可知,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代,乡里社会就有敬老、睦邻的乡规约定。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虽曾偶有负面作用,但总体上以正面作用为主导,它们不仅促进了儒家伦理思想的普及,还有效化解了基层社会矛盾,并对山林、水源等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等起到良好作用。

现存赣鄱地域的方志和族谱等文献资料,为我们揭示了该地区人民特别重视用乡规民约去保护自身生存环境的史实。宗族制定了通俗易懂的乡规民约,并通过宗族活动宣讲,立石碑和树木牌于田间地头,抄写于宗族祠堂墙上,挂牌公示于宗族祠堂等多种形式,使乡民们耳濡目染,明确知晓何种行为被允许、何种行为被禁止、何种行为应当践行,以及何种行为会受到惩戒和奖励。这些乡规民约中的劝善性规范,如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以及忠君、敬老、孝悌、睦邻等价值观,对引导乡民互帮互助、遵礼向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惩戒性规范则禁止并惩罚赌博、乱伦、奢靡、兴讼、斗殴、私宰耕牛、邪教、烟害、抢嫖等不良社会恶俗,对塑造乡民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淳美社会风俗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环境保护方面,赣鄱地域的乡规民约也展现出了深厚的生态智慧。它们大多禁止并惩罚伐坟山、乱砍滥伐树木、纵火山林等行为,并特别重视水源的保护。乡民们认为水乃村落的生气所在,因此必须净化环境、清洁水源。乡规民约中往往会规定定期清理沟渠、禁止日出前在沟里洗衣、禁止渠内放养鹅鸭、禁止挖断蓄水堤坝等,以保护水资源。此外,乡规民约还重视保护动物和土壤资源,如禁止盗牵耕牛私宰,禁止有病猪牛入村以防止疫病、禁止偷盗家禽家畜和塘鱼、禁止药鱼等,以及通过族规家法保护自然资源,如禁止在道路两旁开种以防沙土泻流壅塞、种植苗木保护山场水土资源、严禁毁林垦种等。

“保环境,生态智慧”已成为赣鄱地域的农耕文化的重要特质。在当代的美丽中国“江西样板”建设热潮中,赣鄱地域的人们正通过这一生态智慧,不断推动保护环境,并且已日见成效,赣鄱地域正逐渐成为当代中国保护生态的样板。

总之,从《赣鄱农耕文化研究》一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赣鄱地区农业和农耕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孕育了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这些遗产包括物质性文化遗产、农耕技术类文化遗产及精神文明类文化遗产等多个方面,这些都是赣鄱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透过这些遗产和遗物,我们不仅能够感悟上古时期的渔猎农耕生活,还能探研赣鄱上古文明的历史演进。只有对这些农业文化遗产有了充分的了解,对赣鄱农耕文化下先进的农耕技术有了充分的了解,对该文化下形成的优良家风有着充分的了解,我们才会对赣鄱先民们的奋斗与努力、对当地地域底蕴深厚的农耕文化油然而生敬意,并努力去传承和发扬光大,我想,这也是我们今日研究赣鄱农耕文化的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沈志忠、伽洪埏)